

张觉述作集

韩非子考论

张觉◎著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述作集”，即源于此。不同的只是，我虽然好古，却信疑参半，所以于“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10YJA720041）

张觉述作集

韩非子考论

张
觉◎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1985年以来研究《韩非子》的总结性成果之一，它不囿于当今的学科壁垒，而从我国古代典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有机性特质出发，对《韩非子》进行了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各个领域。除了论述韩非的政治思想，本书对《韩非子》的版本流传、著作年代、文学成就、史学价值、研究概况等，都作了详尽深入的学术研讨与全面细致的系统论述。

责任编辑：江宜玲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考论 / 张觉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8
（张觉述作集）

ISBN 978-7-5130-1425-0

I. ①韩… II. ①张… III. ①法家②《韩非子》—研究 IV. ①B226.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8854 号

张觉述作集·韩非子考论

ZHANGJUE SHUZUOJI · HANFEIZI KAOLUN

张 觉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39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386 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jiangyiling@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1.5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ISBN 978-7-5130-1425-0/B·057 (4297)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张觉二〇一二年四月二日于南翔白金院邸（张凌云摄）

张觉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与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字学。

已由20家出版社出版著作40种，主要有《韩非子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版）、《白话搜神记》（岳麓书社1991年版）、《韩非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论语〉〈孟子〉精华译评》（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曾巩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潜夫论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常用成语词典》（黄山书社2000年版）、《〈孟子〉句式变换释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现代汉语规范指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韩非子〉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商君书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韩非子：帝王的法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韩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韩非子校疏析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商君书校疏》（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此外，已在《文史》（北京）、《中华文史论丛》（上海）、《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学术研究》（广州）、《汉学研究》（台北）、《孔孟学报》（台北）等125种刊物上发文307篇，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韩非子》微观研究”（批准号：04BZX031）、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韩非子校疏》（批准编号：0314）和《商君书校疏》（批准编号：08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韩非子〉考论》（批准号：10YJA720041）的研究工作。

现正在从事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吴越春秋校证注疏》（批准号：13ZS058）的研究工作。

述作集自序

人活在世界上，有的地位甚高，身价不菲，但终其一生，其价值仍然可以用单一的经济尺度去衡量——一辈子赚了多少钱；有些人的人生价值就不是单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不朽”。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范宣子问叔孙豹：“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回答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①由此看来，人的政治生命与其生理生命同样脆弱。从政者即使能显赫一时，但随着其心脏停止跳动，其政治生命也往往就此结束，而不可能不朽。诚然，就是在古人心目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立德”、“立功”，我看其对后世的作用也有限。据杜预、孔颖达的注疏，所谓“立德”，是指黄帝、尧、舜之类的圣人“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所谓“立功”，是指禹、稷之类的贤人“拯厄除难，功济于时”^②。这些圣贤，虽然因其功德而名垂青史，但其功德也不过是让人缅怀而已。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创制的东西早已不再有什么实际的效应了。这种情况犹如司马迁所感叹的那样：“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③

在我看来，最有不朽效应的应该是“立言”，因为如果能“立言”于世，则可以永远使后人在学习中获益。诚如魏文帝曹丕之《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

①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79页。

② 同上。

③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世界书局缩印本，第333页。



斯志士之大痛也。”^①

的确，人在世上走一回，唯有给社会留下一些永远值得后人利用的东西，其生命才有意义。否则，其存在与否也就无足轻重了。对于真正的文人来说，最高的追求应该是有不朽之作传世吧。正是受到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我才身处贫贱而仍加务于著述。但是，曹丕所说的写文章也好，今人所说的著书立说也好，与“立言”诚然是不能画等号的。试看今日之世界，文章浩瀚如海，图书堆积如山，其作者都能算作“立言者”而不朽么？显然不能。历史是最公正无私的评判者。只有通过历史的冲刷而流传不衰反复重印的著作才是不朽之作，只有贡献了传世之作的人才能永远活在人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甘心久坐冷板凳，常泡图书馆，长年累月孜孜矻矻，不遗余力精益求精，其目的无非是想使拙著赢得读者的青睐而久传于世。

据孔颖达的说法，“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杨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②。如此，则我虽然努力于著述，却又离立言者甚远。因此，我不敢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文集”，而用了一个前人未曾用过的名称“述作集”。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③ 我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述作集”，即源于此。不同的只是，我虽然好古，却信疑参半，所以于“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换言之，即既欲有所继承以集前贤之大成，又欲有所发明以成一家之说。窃以为唯其如此，方能使自己的作品受人青睐而不朽于世。诚如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④ 治学不能不有所思考，有所创新，但思索却又必须以学习与继承为基础。所以，无“述”则学无根底，无“作”则学无所成。我之追求“述而又作”，即基于这样的认识。当然，我的这一追求也与自己的才智有关。如今很多能人名流都是天才的创新发明家，所以他们能够“不述而作”，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课题，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这是我所无法企及的。

出版文集往往是大家的事。现在我出版自己的述作集，其实并不意味着要以大家自居。我出身贫寒，命运坎坷，一生贫贱，出版述作集本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① 曹丕：《典论·论文》，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720页。

②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次有立言”孔颖达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79页。

③ 《论语·述而》，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81页。

④ 《论语·为政》，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62页。



1949年3月9日（农历二月初十）夜，我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县茜泾镇东街的倪家，这是当时我家借住的房子。平民百姓无家谱，所以大都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谁，我家也一样。据我父亲的记忆，只知道我的曾祖叫张燕亭（1881~1944）。由于我父亲外出工作，我的童年是在祖父母的抚育下度过的，因此也受到了叔父的启蒙教育。正因为如此，我入学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我1965年考取苏州高级中学后才一年，原本稳上大学的前途一下子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片红”使我不得不带病回乡务农，十年青春就这样在贫困的挣扎中耗掉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南京大学，接着又考入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由于老家已分田到户，我还得花不少时间回家种地。为了彻底摆脱务农生涯而潜心于治学，我于1985年初毕业后放弃了在重点大学任教的机会，到了空军政治学院任教。哪知好景不长，1989年学院首长安排我转业到太仓县中学教书。为了利用上海的文献资料以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我只好辞不赴命而下岗待业在家。在下岗待业还未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当时，作为一家之长，我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与种种坎坷恐怕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与忍受的。

为此，我穷而发愤，夜以继日，卖文为生。在待业的六年中，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还撰写出版了《商君书·韩非子》（岳麓书社1990年版）、《白话搜神记》（岳麓书社1991年版）、《韩非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论语〉〈孟子〉精华译评》（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韩非子〉精华译评》（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白话商君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当然，这些成果虽然凝结着我身处逆境时的顽强、勤奋与心血，但我更要说的是，它们离不开出版界同仁的热情帮助与支持。正是他们的雪中送炭，点燃了我熬过严冬的希望，增强了我抵抗强权的信心，使我身处铁屋之寂寞而仍然不觉得孤独，从而支撑着我艰难而顺利地度过了那黑暗而冷酷的六年待业时期，同时也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基础。

1995年，在空军政治学院石柏年政委的帮助下，我终于结束了待业生涯而转业至上海财经大学基础教学部任讲师，并于1996年任副教授。此后虽然忙于教学工作，但写书之兴趣与动力犹存，故丹黄仍不绝于手，于是又有《曾巩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潜夫论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新著问世。

人的希望或欲望大概总会随着适合其发展的条件而不断发展。在1986



年，发表一篇文章就已令我高兴万分。1990年，出版一本书会令我激动好一阵子。在那个时候，哪会萌生出版论文集或著作集的奢望呢？然而，书写得多了，也就有出版著述集的基础与愿望了。1998年开始，我将出版《张觉述作集》的计划寄给了不少出版社，但均未成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一时也不清楚。直到我历经磨难于2002年又一次申报教授职称受挫后，才稍微有所了悟——我非常珍视自己的著作，不过是犯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毛病：“夫人善于自见……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① 这些古籍译注之作在大多数学者眼中其实算不得什么学术成果。

当时某评委认为我不够教授资格，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我的古籍译注之作根本不能算学术成果，二是我出那么多书不正常，三是我的论文涉及文史哲而所申报的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果不突出。

没想到我摒弃一切娱乐生活而夜以继日地拼搏，只换到了一个否定。

当然，这种观念也并非某评委所独有。

在一些学者名流眼中，搞古籍译注根本算不上学术研究，如今的社会科学课题或评奖中大多没有古籍译注的一席之地，即反映了这一学术观念。有一位好心的老师曾劝我说：“你还是去搞一点学术研究，别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由此我深深地感悟到古代将文字训诂之学称为“小学”的道理——这种既够不上“学术”又算不上“研究”的工作，何以不“小”呢？

至于著作多不正常，中国社科院邓尉先生也说过：“深圳有位学界朋友告诉笔者，一个40岁的人来求职，如果拿出三本专著来，你就赶紧打发他，肯定是骗子；如果拿出两本专著来，你要怀疑；如果只拿出一本书，还可以看一看。——当然，他说的专著是有自己心得的研究成果。这话虽然有点极端，也不无道理。”^② 量多者其质必不佳，而无须细看其内容。某评委大概也是以此“学术标准”来评判拙著的，他没有把我当作骗子，已是够幸运的了。

再者，在我们这个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的“专家”时代，教授应该是某一研究领域的专家，文史哲兼顾只能被认为是杂而不专，这也已经是评委们普遍认可的评审准则，所以我研究面太广而受非议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在职称评审时，我没有申诉的权利；即使有申诉的权利，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大部分著作，从其雅俗共赏的基调中就可以看出，它们本来就是为广大读者写的，而并不是为少数学界名流写的，非要这些“专家”认可干吗？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说：“一个以科研为

① 曹丕：《典论·论文》，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720页。

② 邓尉：“怪现象：70个教师68个教授”，见《社会科学报》2001年10月25日，第6版。



生命乐趣的人，在人文学科中寻求自身价值的人，大可以领悟禅家的态度，不必把这些看得太重。须知，参透了，必要别人承认何为？”^①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古籍译注之作也并非没有肯定者，它们也曾受到广大读者乃至一些专家的青睐与赞赏，因而往往一版再版。拙著在大陆与台湾地区出版后，各地读者纷纷来信，认为它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同于一般的古籍译注本，为研究古代哲学、史学乃至文学者所必读。南京大学一级教授兼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程千帆先生曾来信说：“译注雅见功力，可宝也。”^②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丁原植教授也来电作了高度赞扬。挪威科学院院士、奥斯陆大学东欧东亚系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认为《韩非子全译》是所有《韩非子》注译本中最好的一种，因而将它用作为英译《韩非子》的底本。截至2012年8月，以古籍译注为主的拙著，累计印数已达462520部，这充分说明拙著还是有读者的。

即使从学术的角度来考察，我以为我的工作也不乏学术价值。由于古今语言与文物典章等方面的差异，因而要使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化典籍真正能“活着”流传下去，使它成为当今乃至将来中华文化建设的丰富资源，必须首先做好其校点译注工作。古人虽然将文字训诂之学称为“小学”，但虽“小”却还是一门“学”，而治此“学”者也还有不少被称为“大师”的，可见这“小学”中也自有大学问，认为它不是“学术研究”实为一种偏见。就是对古籍今译提出过严厉批评的高严先生也曾说：“古文今译是一门大学问，非浅识末学者所能胜任。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古籍整理研究的最高形式，只有当版本、目录、音韵、训诂、校勘、考订、语法、断句、标点的工夫都用到之后，方可谈今译；不仅如此，它还要求译者有相当好的现代语文水平，如果读者对象是儿童，还要掌握儿童语言的特点。正是如此，即使饱学之士，在古文今译任务面前，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曾这样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这段话既适用外文翻译，也适用古文今译，充分说明，这是一项不好对付的学问，如果学无根底，是不可草率从事的！”^③ 高严先生与那些一味鄙视古籍译注的学界名流相比，其学术眼光恐怕要高明一大截。因为高先生虽然严厉地指责

① 王家范：“专家成见也可无意‘杀人’”，见《社会科学报》2001年10月25日，第6版。

② 张觉：“程千帆师书信三札”，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2日，第17版。

③ 高严：“今译十弊”，见《光明日报》1992年4月26日，第3版。



“今译十弊”，但对今译工作并无偏见，而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它的学术地位。诚然，清代学者杭世骏早就说过：“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① 这些言论真应该让那些对古籍译注不屑一顾的学界名流好好看看。

可惜的是，古籍译注之作如今在一些学术部门中不算学术成果，于是一些专家教授因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不屑为，而一些“学无根底”的人也不把它当作学术研究来从事，只是以混稿费的态度去搞古籍译注，结果就产生出品质低劣的古籍译注本而为众人所指责。对此，高严先生曾指出“今译十弊”：“出版无统筹，一书有数译，一弊；版本不求善，率尔而操觚，二弊；考校不用功，将错而译错，三弊；学问不到家，译错不知错，四弊；主编不统稿，前后相矛盾，五弊；选译无标准，避难而趋易，六弊；文字素养差，生涩又费解，七弊；翻译不到位，半白夹半文，八弊；风格不统一，忠实原著难，九弊；不求信雅达，外行充内行，十弊。”^② 这种种弊端，败坏了古籍译注的声誉，使古籍译注名声扫地，从而玷污了其中的佳作。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另一件可悲的事，则是人们所说的：现在已进入了读图时代，青少年喜欢看的是配图的“文化快餐”。如果真是这样，则长此以往，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藏将被埋没而无人问津，或只能任凭那些学术骗子信口开河，哗众取宠。这种学风实在令人担忧，但愿将来会有所改观。

出于信念与爱好，我并没有因为学界对古籍译注的指责与某些评委对拙著的否定以及青少年学风的转向而有所动摇，而仍然潜心于我所钟爱的古籍校疏工作。

张之洞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③ 综观当今流行之典籍，精校之本不多。如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④ 与《韩非子新校注》^⑤，高亨的《商君书注译》^⑥，均利用第二手乃至第

①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八《李太白集辑注序》，见《续修四库全书》14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② 高严：“今译十弊”，见《光明日报》1992年4月26日，第3版。

③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见《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页。

④ 该书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⑤ 该书于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⑥ 该书于197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手材料编著而成，以致以讹传讹，贻误无穷。有鉴于此，我立志重振古籍译注之学术风范，注重学术考校，写出带有学术研究味道的严谨而又具有较高质量的古籍校疏本。我想，做到了这一点，就一定能获得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可，从而使自己的著作流传不衰。因此，我一直没去迎合当代的专家评委们根据其癖好所拟定的“课题指南”写一些不能流传于世的“专著”以猎取名利，而仍然坚持不懈，决定倾注更大的精力与财力，将以往的著作，特别是古籍译注之作，作一次全面详尽的考校修订，在以往译注的基础上进一步汇校善本，以便使拙著成为兼具资料性、权威性、学术性、通俗性的经典，并汇编为《述作集》逐渐推出，供认可拙著的读者使用。

出版述作集的夙愿已经开始成为现实，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在此，我首先要向此前慷慨解囊而购置拙著的45万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与支持。因为经验告诉我，我的学术生命，在过去或现在，主要还是靠广大读者维持着，而不是靠什么部门用经济实力支撑着。在将来，应该也是如此。《述作集》的出版，如果没有广大读者的热爱支持与慷慨解囊，也将会难以为继。只要有广大读者的支持，那么少数名流的非议与领导们的否定也就无关紧要了。

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忘记祖父张瑞良（1902～1972）、祖母俞秀英（1909～1989）、父亲张永泉（1930～）、母亲林月娥（1929～）、叔父张永奎（1939～）的养育启蒙之恩与程千帆（1913～2000）、周斌武（1924～）等教授的精心栽培之德，如果没有他们的培养，就没有我的才学与成果。同样，我也不会忘记章培恒、严佐之等教授对我古籍整理工作的热情支持，不会忘记梅季坤（岳麓书社）、李立朴（贵州人民出版社）、倪腊松（贵州人民出版社）、李大钧（中国旅游出版社）、金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褚赣生（东方出版中心）、宋启发（黄山书社）、徐文堪（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吕健（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德明（岳麓书社）、郑明宝（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宜玲（知识产权出版社）等出版界同志先后倾注的厚爱之情以及吴格、刘一萍、钱振民、郭立暄、龚洁荣等先生在图书资料方面的相助之力，如果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我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逐步积累而内容丰富的著作问世。

此外，我的同事龚敏，博士研究生黄吉辉，硕士研究生欧冬梅、郑兴兰、马静、尤婷婷、吕佳妹、吕佳、徐鹏、张晓晔、孙枫、刘妍妍、周娟娟、李霞飞、曹柳、何晓芬等也曾参与过部分工作，特此说明。

总之，我谨将这《述作集》奉献给一切爱我的读者、亲人、师长、同志、朋友、学生，并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与诚挚的祝福。

但愿拙著因品质之有益于读者而流传久远，从而使我的感谢与祝福也与



日俱增，使后人能永远铭记爱我者的恩德，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对于拙著中的不当谬误之处，我热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使拙著不断完善而成为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化者所必备的要籍。

最后，附自题二首，以与同道者共勉。

早年心慕高校洁，岂料身陷净土黑。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贫而无谄常落寞，穷且发愤勤述作。笑看有司皆走肉，倾心拙著寄寥廓。
是为序。

张 觉

2012 年 10 月 22 日于南翔芳林路白金院邸

前言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它将永远引发人们的浓厚兴趣与高度关注。但是，大概是因为《韩非子》中有不少卑鄙肮脏的东西吧，所以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学者们往往都大谈儒家学说而不谈法家思想，大谈孔、孟而不谈韩非，似乎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不过是儒学而已。

其实，只要稍稍对中国的历史有所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儒家思想虽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宣扬，但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却始终是历代君主独裁政治的理论基础。诚如毛泽东所说：“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①只是由于韩非的某些术治理论过于卑鄙与刻露，所以历代统治者大多只是走私式地运用它罢了。应该说，阳儒阴法才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抛弃了法家思想而侈谈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能精辟地解释中国的历史，而且也不能深刻地了解中国的现在；而要清醒地认识君主专制制度的毒害，彻底地摆脱专制独裁思想的束缚，使我们的思想从中世纪的独裁崇拜中完全解放出来，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韩非提倡严格的法治，这虽然因为限制了各级官吏的谋私活动、妨碍了君主的为所欲为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贬抑，但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值得弘扬的宝贵遗产。

即使是《韩非子》中那些卑鄙肮脏的东西，了解一下其实也有利而无害。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要说是纷乱的战国时代，就是现在的世界，也并非那么纯粹，其间有光明也有黑暗，有民主也有强权，有法治也有专制，有真诚也有诡诈，有热忱也有阴险，有仁爱也有刻薄，有慈善也有暴虐，有施舍也有掠夺……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其间善良的一面而不了解邪恶的一面，那就会把世界看得很美好，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仁人君子。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可爱的天真，而只是一种愚蠢的幼稚。这样的人往往会缺乏应有的社会生存免疫力而容易上当受骗乃至遭到原本可避免的致命伤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读读《韩非子》，了解一些害人的罪恶勾当以提高自己的防范能力，又有什么坏处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44页。



总之，深入地了解一下《韩非子》，明确一下韩非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在目前的学术气氛下，这可能尤其重要。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韩非子》作为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能够经历两千多年的筛选而仍然广为流传，就不仅仅是因为它影响了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意识形态了。大凡一种宏伟灿烂、经久不衰的著作，它的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被公认为集大成者的韩非，其著作也正是如此。韩非的思想十分丰富广博，仅将他的思想当作法家思想的代表，实际上还不够。他的思想，不仅集先秦法家之大成，而且也是先秦各种思想成果在他头脑中经过深刻反思后的产物，更是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与复杂诡诈的社会道德在理论界的投影。同时，韩非又是一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语言文学大师。他的著作，不但记述了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反映了先秦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而且文势雄伟峻峭，析理周详透辟，辞章华美酣畅，是先秦四大散文巨著之一。所以，《韩非子》既是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渊藪，又是绚丽灿烂的文学明珠；既是珍贵丰富的史学宝库，又是典型精粹的语言资料。它对于我们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以及语言，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面对这样一部丰富多彩的学术巨著，要进行全方位的学术审视与研讨，以便一般读者能系统而深刻地了解它，为进一步研究它打下坚实的基础，笔者在撰写时曾颇为踌躇。这不仅因为《韩非子》一书内容贍富，其中有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还有一些结构布局与写作方面的问题需要处理。作为一本对古代文化要籍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首先有两个写作问题摆在我面前：一是如何将丰富而系统的研究成果纳入较小的篇幅之中，使本书既能周详地论述《韩非子》各方面的问题，而又不失为简约；二是如何使学术论著能适应现代读者的需求而避免曲高和寡。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处理办法是：统筹兼顾，避熟就生。按理说，《韩非子》的主要价值在思想方面，所以应该对韩非的思想作详尽的论述；而且，其思想十分丰富，详细地论述一番，写个二三十万字也并非难事。但我并没有这样做，而只用了一章的篇幅，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一下韩非的主要思想，即他的政治思想以及构建其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至于其他方面的思想，如韩非的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等，我就忽略不论了。这是因为：一、古往今来研究韩非各方面思想的专著论文极多，读者容易找来看。二、作为一本对古代文化要籍进行综合考述的论著，如果对其思想详加论述，反而会使全书的比例失调而流为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那么本书的特



色也就难以充分显现了。有鉴于此，本书对韩非思想的论述采取了相对简省的办法，而对其他一些过去研究成果较少、读者不易了解却又应该了解的内容，如《韩非子》的版本流传、真伪辨别、著作年代、文学成就、史学价值、研究概况等，则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述，以便使本书的结构布局显得更为匀称。三、现代学术界对韩非思想的研究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如果详加复述，则将有违陈言务去的创新原则而令人生厌；如果故意标新立异，则又将违反实事求是的学术规范而贻笑大方；只有从自己的体会出发去采撷前贤之精论而出之以简明的论述，或抒己一得之见以澄清学界之误会，才不致于徒耗篇幅而有可能赢得读者的青睐。例如，通过考证，我认为学术界关于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的成说靠不住；有人认为韩非的思想学说太刻薄，也有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关于韩非弟子或刘向编定《韩非子》的说法也值得商榷；至于《韩非子》版本源流方面诸多以讹传讹之说，更亟待纠正。此外，在对《韩非子》研究史进行回顾时，我特别注意揭示其创新与失误之处，以便今人在借鉴时能吸取其有益的研究方向，避免陈词滥调，如认为李斯重视韩非学说的实际政治效用具有合理性，孔鲋批韩时的史学考证具有开创性，司马迁对韩非学说的独特概括为不刊之论，班固的简单化评判以及忽视社会现实因素的批评倾向有失公允，如此等等。

对于第二个问题，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写法倒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对于不同的内容，又不宜采取划一的写法。我的处理办法是：既把它当作一本学术论著来写，又力免单调枯燥。也就是说，在内容上追求学术性，在语言表述上则追求可读性，力求把本书写得高深而不古奥，通俗而不浅陋，努力使它成为一本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著作，使它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较容易地登堂入室，摸清《韩非子》一书的底细，而且能给专业研究者提供较高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从1985年开始花了整整三年时间专攻《韩非子》，凡能搜罗到的研究资料尽量饱览无遗，以后又时时留心，在《韩非子》的研究上花了不少精力，以期使本书对于各个问题的论述尽可能达到现代最高的研究水平。同时，我又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方面反复琢磨，仔细推敲，努力使本书的论述达到条理井然、文从字顺的地步。当然，对不同的内容，我也尽量使用与它相称的语言。如对其思想的论述，我追求严肃而又生动的笔调；对其文学成就的品评，则追求句子的整练与辞采的华美；对其史学价值的论述，则追求用语的平实明了。

显然，从当今的学科分类来看，本书内容包含了哲学社会科学多门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管理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所要研究的问题，所以，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曾分别发表于境内外各学术刊物的不同学科栏



目之中。现在我将它们补正修订或改写后汇集在一起，虽然作了系统的编排，但如果从单纯的哲学角度、文学角度或史学角度来审视本书，则可能会有“庞杂”而“单薄”之感——全书既广泛涉及了各种学科，而在某一学科方面的论述又有限。不过，如果从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学术观点来看，这种汇集就是一种有机的组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合理的。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的文化要籍往往不是什么纯粹的哲学论著、文学作品或史籍，它们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谓的“六经皆史”^①，不过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国古代文化要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有机性特质。人们把《庄子》等子书、《史记》等史籍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则是从另一个侧面认可了古代文化要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有机性特质。由此看来，以传统的学术视角对古代文化要籍进行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实是由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所决定的，因而也是自然而然的，符合学术研究内在逻辑的。虽然这种研究不能不受到现代西方的哲学意识、文艺理论、史学观念的影响，但在注重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在顾全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与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方面，恐怕还是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总之，如果从当代的西方科学体系出发，这种适应了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内在特质的综合研究就如同中医一样，看起来实在有点“庞杂”而不够“科学”。但是，从传统国学被现代学科体系肢解毁灭而在现实中犹存不亡乃至频频出现国学热的历史进程来看，则本书对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学传统来说，恐怕也不乏现实意义。如果本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对国学的弘扬有所裨益，从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并久传于世，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我撰写此书时所追求的目标。诚然，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要籍，如果没有文献学、小学（传统语言文字学）、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没有博古通今的才学，没有对该典籍作深入的研究，是难以把这种通考综论性质的国学论著写好的。对于《韩非子》这样一部丰富多彩的学术巨著，尤其是这样。笔者的才、学、识都有限，所以，我虽然下了大力气，想把拙著写成一本阅读与研究《韩非子》所必备的参考书，想让它受到读者的青睐而流传下去，但这种想法是否能如愿以偿，还需由读者来作最后的评判了。至于书中的遗漏与错误，也祈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最后要说明的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吴格先生、刘一萍老师以及上海图书馆的郭立暄先生为我借阅各种图书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拙著虽然水平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12月版，第1页。